

# 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下认识中国的“外籍新娘”

沈海梅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500)

**摘要:** 越来越多的“外籍新娘”嫁入中国,“外籍新娘”出现在许多媒体和新闻报道中。学术界使用的“外籍新娘”、“跨国流动人口”、“外籍流动人口”等概念都不能准确描述因婚姻流入中国的外籍女性流而不动的情形。研究者将这类现象视为跨国婚姻或女性的跨国流动,但不能准确分析已经在中国长期定居的跨国婚姻女性人群的移民事实。笔者认为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下认识中国的“外籍新娘”,她们已经具备了“国际移民”定义的基本特征。这些女性像所有迁徙到世界任何国家的移民一样,是“跨国移民”。因相关移民法律政策缺失,这些来自亚洲国家的女性婚姻移民一直难以取得合法身份而滞留中国,成为事实上的“非正规移民”,对中国当前的移民政策提出新挑战。

**关键词:** 外籍新娘; 跨国移民; 非正规移民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254(2012)05-0006-08

## Understanding China's "Foreign - nationality Brides" in the Framework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

SHEN Hai - mei

(Yun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for Ethnic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 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o - called "foreign - nationality brides" are married into China, the phrase "foreign - nationality brides" can be seen in dozens of media and news reports. However, several frequently - used concepts in academic field such as "cross - border mobile population" and "foreign mobile population", including "foreign - nationality brides", cannot offer an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situations of those women who are married into China and already settle down thereafter. Researchers regard such phenomena as the female's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r cross - border marriage, making it impossible to analyse accurately the facts that those women in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have immigrated and become permanent residence in China. The author presumes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foreign - nationality brides" can be done in the framework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 because all so - called foreign - nationality brides already have the very basic elements needed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They are a normal group of transnational female immigrants and have much in common with all the other mobile population who immigrate across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Owing to the fact that female marriage immigrants from Asian countries have great difficulty obtaining legal identity in China due to the lack of relevant immigration laws and policies, they have to strand in China and become the real irregular migrants.

**Key words:** foreign - nationality brides; transnational migrants; irregular migrants

随着中国 GDP 的增长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外籍新娘”嫁入中国。婚姻市场中的“外籍新娘”已经出现在许多媒体和新闻报道中,

而渐渐被中国民众熟悉。然而,中国社会中日渐增长的“外籍新娘”需要在跨国移民的理论框架下加以重新认识。

收稿日期: 2012-09-10

作者简介: 沈海梅(1968-),女,云南永仁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

## 一、中国从传统的移民输出国转变为移民接收国

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一个移民输出国,许多世纪以来,老一代的中国移民作为劳工移徙美国、欧洲和东南亚地区寻找就业机会和新的生计。进入21世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移民们已经作为技术移民、投资者在全球化的移民浪潮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全球化中的“世界工厂”和新兴经济体,中国也在吸引数以百万计的全球移民,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移民接收国。北京的望京“韩国城”,上海古北的“日本城”,浙江义乌的“中东街”,广州非洲裔的“布鲁克林”区和云南大理的“洋人街”,这些各具特色的国际移民社区成为中国城市发展中的新景观,标志着中国跨国移民时代的到来<sup>[1]</sup>。

据新华社报道,2007年常住上海的日本人首次超过常住在纽约的日本人<sup>[2]</sup>,上海成为日本人在海外最大的移民社区。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统计,2009年,外国人入出境共计4372.7万人次,来华外国人中,观光休闲1013.3万人次,访问387.1万人次,服务员工227.3万人次,会议商务136.6万人次,其他入境目的330.4万人次<sup>[3]</sup>。其中,服务员工一类包括了在各类跨国公司中来华从事各类工作的外国人。

2010年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首次将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纳入人口统计。据“六普”数据显示,“在这次普查中,居住在我国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234829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21201人、台湾地区居民170283人,外籍人员593832人,合计1020145人<sup>[4]</sup>。”其中,外籍人员593832人,数据只是反映接受普查的外籍人员,比实际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人数量少。

表1 第六次人口普查居住在中国的外籍人员数量排在前10位的国家

排名	国家	人数	排名	国家	人数
1.	韩国	120750	6.	加拿大	19990
2.	美国	71493	7.	法国	15087
3.	日本	66159	8.	印度	15051
4.	缅甸	39776	9.	德国	14446
5.	越南	36205	10.	澳大利亚	13286

(根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制作)

从表1可看到,在中国的外籍人员数量

排在前10位国家中,来自欧美国家和来自亚洲国家各占一半,来自韩国的外籍人口名列榜首。其中,来自东盟国家的缅甸和越南人数位居第四、第五,对于与这两个国家接壤的云南省,这是比较有意义的数据。可以说,这是云南省作为GMS开放前沿20年和国家面向东盟开放的“桥头堡”工程产生出的结果。

自1992年以来,云南省发挥区位及资源优势,积极参与GMS(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周边的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GMS国家已成为云南省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GMS国家在政府合作机制建立、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石油、鲜花等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和橡胶、花卉、甘蔗等鸦片等替代种植以及农林科技合作等领域展开合作。目前,云南至老挝、越南等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已开通16条,为边境地区人员和货物往来创造了便利条件。这些合作与交流,不仅进一步加快了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往来,随着商品、货物的流通,也增加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间居民的跨国流动与交往<sup>[5]</sup>。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基础上,2009年7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考察云南后提出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2011年5月6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2011年5月30日,云南“桥头堡”建设正式启动,云南面向东南亚开放的态势正在形成。受其推动,未来几年东盟各国面向中国的人口跨国流动还将进一步上升。正是由于云南作为“桥头堡”的地缘优势,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有47396位外籍人员居住在云南省。云南省成为中国外籍人数排在前十位的省份,继广东、上海、北京、江苏、福建等省、市之后位居第六<sup>[6]</sup>。

### (一) 移民女性化与亚洲女性跨国移民内流中国的动因

跨国移民,又称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Immigrants)“系离开本人之祖国或此前的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个国家的人。”<sup>[7]</sup>国际移民组织《世界移民报告(2010年)》指出,这类“生活在非本人出生国的跨国移民”,2000年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有1.5亿人,到2010年移民人数已

经达到 2.14 亿,并预计到 2050 年时,移民的人口数将超过 4 亿,达到 4.05 亿<sup>[8]</sup>。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女性移民成为国际移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发展趋势。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卡斯尔斯(Castles)认为,移民的女性化是当代移民的一个趋势。<sup>[8]</sup>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RISD)的报告显示跨国移徙者当中的女性比例不断攀升,2000 年 49% 的移民是妇女<sup>[9]</sup>。在亚洲地区的一些国家,女性移民总数超过男性,有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女性移民达 70%<sup>[10]</sup>。特别是 2000—2003 年间,“从印尼到国外务工的人员中,女性占 79%。”<sup>[11]</sup>正如学者们所看到的,最近 20 年亚洲女性移民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sup>[8]</sup>从中国 2010 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在中国境内接受普查的外籍人员有 593 832 人,其中,男性为 336 245 人,女性为 257 587 人,流入中国的女性占外籍人员的 43%。

全球化时代的跨国移民呈现移民女性化的特点,中国也成为亚洲女性移民的目的地国家。亚洲女性移民在中国劳动力和婚姻市场中扮演特殊角色。继台湾、香港之后,菲律宾女佣进入北京、上海、深圳,为新兴的中国富人家庭提供家政服务。而人口出生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的陕西、河南、安徽、广东等省份因男女性别失衡和“婚姻挤压”对外籍新娘存在刚性需求,中国女性婚姻人口短缺迫使大量中国农村的贫困光棍冒着风险从朝鲜、俄罗斯、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购买新娘。

香港特区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2010 年有 13.7 万菲律宾女佣在香港工作<sup>[12]</sup>。2010 年香港游客在菲律宾遭劫持事件发生后,香港市民仇菲情绪加剧,一些菲律宾籍女佣被雇主解聘。许多菲律宾女佣难以在香港找到工作,而从香港进入深圳、上海、北京的新兴富人家庭从事家政服务。雇主雇用菲佣的花费年均 6 万元,许多推销菲佣的广告说雇用一个菲佣就等于同时雇用了三个家教、一个保姆和一个英文助理,菲佣能以一抵三。2011 年中菲黄岩岛事件升温后,中国大陆雇用菲佣的家庭减少,菲佣没有在中国大陆的家政市场中扩大规模,许多职位被印佣、泰佣等取代。

婚姻市场中的“外籍新娘”出现在许多媒体

和新闻报道中,而渐渐被中国民众熟悉。学者们也使用此概念来分析因婚姻流入中国的这些外籍女性在中国的处境和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有学者就广西、云南边境地区通过婚姻流入的越南籍妇女生存现状进行初步调查<sup>[13]</sup>。有的学者依照政府公安部门户籍管理所使用的“外籍流动人口”概念来描述这些人群的流动,尤其是跨国人口流动<sup>[14]</sup>。显然,目前学术界或媒体所使用的“外籍新娘”、“跨国流动人口”、“外籍流动人口”等概念都不能准确描述因婚姻流入中国的外籍女性流而不动的情形。研究者将这类现象视为跨国婚姻或女性的跨国流动,但不能准确分析已经在中国长期定居的跨国婚姻女性人群的移民事实,笔者认为应该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下认识中国的“外籍新娘”。

自 19 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就关注移民问题,联合国把跨国移民定义为:除各国正式派驻他国的外交人员,除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兵等跨国驻扎的军事人员之外,所有在非本人出生国以外的国家定居一年以上的人口均为跨国移民。国际移民组织认为,“跨国移民是指居民跨越国境离开出生国或定居国,前往他国作短期或长期居留的迁徙。”<sup>[15]</sup>离开原籍国或惯常居住国的人的迁移,目的是在他国永久或临时居住下来。因此,迁移时需要穿越国际边界,具体可分为有记录的移民(documented migrant)、经济移民(economic migrant)、非正规移民(irregular migrant)、技术性移民(skilled migrant)以及临时性移民工人(temporary migrant worker)5 类<sup>[17]</sup>。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化中的跨国移民受到特别关注,在国际跨国移民研究中,有多种理论来讨论人口的跨国流动,解释移民跨国流动的动因,移民在目的地国家的身份获取、生存生计及文化适应。比如,较早时期的以莱文斯坦(E. G. Ravenstein)为代表的“推-拉”理论,认为移民并不是完全无序盲目流动的,是因为迁出地的不利因素导致的“推”力和迁入地的各种有利条件形成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sup>[16]</sup>。以里维斯(W. A. Lewis)为代表的经济均衡移民理论,以迈克尔(Piore Michael)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等理论从人口迁移的动因建构理论模型,强调个人终将寻求能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国家定居,这受制于

个人经济能力及移出与移入国的相关法律、政策<sup>[17]</sup>。经济理性选择理论以 Julian Simon 的“西蒙原理”（Simon Principle）为主要代表，该理论把经济贡献作为移民政策的首要基本原则（Simon, 1984）。而移民网络、多元文化论等理论，侧重于移民延续、社会融入层面的探讨<sup>[18]</sup>。斯蒂芬·卡斯特（Castles）指出“国际移民时代”呈现移民的全球化、加速化、多样化和女性化趋势<sup>[8]</sup>。女性化的移民趋势必须重新审视女性移民的动因、移民过程、面临的问题及其法律、政策需求。

中国政府已经实施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以及正在建设的“两强一堡”工程，使得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云南省近些年成为亚洲女性移民进入中国的重要过境通道、中转站和目的地。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 4 060 公里，有 16 种民族跨国而居，边民通过互市、通婚流动往来密切。来自越南、老挝、缅甸等国的亚洲女性与居住在云南边境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妇女一道，近些年成为这一区域跨省界、跨国界流动和跨国移民最为活跃的人群。

以往学者在讨论妇女的流动时，较多分析了妇女找工作、“务工经商”、“随迁”、“婚姻嫁娶”等自愿流动的状况。根据云南的具体社会发展背景，实际上，一些妇女的流动却是由多种因素影响而被迫流动的。笔者 2010 年在德宏州瑞丽市调研时对生活在弄岛乡的一户傣族村民家进行访谈。户主波陶望有二子一女，其长子因吸毒而与妻子离婚，离婚后的妻子前往山东打工，后嫁到山东一农村。其女儿嫁在本村，原本与她的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但因其女婿吸毒，继而波陶望的女儿也染上毒瘾，夫妇俩都成了瘾君子，婚姻也难以继续维系。离婚后，波陶望让女儿到山东打工，就是希望她远离毒品，而最终戒毒。两年后，女儿戒了毒，并再婚，也嫁到山东。可见，原来这个家庭中的两个妇女都因毒品问题而从云南边境地区流动到中国内地省份。年老的波陶望夫妇与其幼子一家生活在一起，农闲时全家人以编竹篱笆为生计。因紧邻缅甸，两国边民们一直以来都保持通婚关系，像该寨子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波陶望的幼子娶了一个缅甸籍的媳妇。然而，在我见到波陶望的幼子时，他刚从瑞丽的

强制戒毒所出来一个多月，这个年轻人显得有些柔弱。他的缅甸籍妻子对他们的婚姻现状并不满意，尽管当地政府在鼓励跨国婚姻的边民到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去登记结婚，但他的缅甸媳妇明确说：因不知道她的丈夫是否真的能戒掉毒，她对婚姻也没有信心，而表示自己不愿意去办理婚姻登记手续。这位缅甸媳妇眼里噙着泪水说，将来可能会回到缅甸，或者去别的地方。瑞丽市弄岛乡波陶望家的事例反映出女性的跨区域或跨国流动变得越来越普遍，并形成云南边境地区妇女跨省际内流与外籍妇女跨国内流的“替补式流动”，即边境地区妇女内流留下婚姻空缺后，来自越、老、缅等亚洲国家的妇女跨国流入，以填补边境地区妇女流走后的空缺，长期定居而成为事实上的“亚洲女性跨国移民”群体。因而，在讨论女性的流动和跨国流动问题时，一些特殊的动因尤其需要加以特别关注：

1. 毒品、艾滋病与妇女流动。云南省是艾滋病的高发地区，云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过 8 万例。由于性传播途径感染艾滋病的不断上升，女性艾滋病感染者正在不断增加，男女比例已由原来的 40: 1 改变为 3.4: 1<sup>[19]</sup>。云南省边境 25 个县是毒品、艾滋病的重灾区，边境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不断上升，特别是女性感染者上升速度快”<sup>[20]</sup>。作为妇女应对艾滋病的策略，一方面，为避免感染艾滋病，边境地区妇女，尤其是年轻妇女通过远距离婚姻出嫁移居外地，或其它流动方式离开村落，来获得更加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和高质量的婚姻，成为边境地区许多妇女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的共同理想。另一方面，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一些男性因吸毒和感染艾滋病，导致劳动力和生计能力下降，加重了妇女的劳动负担。许多妇女因此陷入赤贫的状况，生计难以维系而被迫离开家人、村落和她们熟悉的社区，流入各级城镇，有的远嫁山东、山西、河南等内地农村。据云南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2008 年在边境 512 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共有外出人口 83259 人，女性占 26.95%”。与此相应，边境地区因疾病引发的妇女流出又诱发境外缅甸、越南、老挝妇女流入中国境内。据上文抽样调查，边境地区“在外来人口 46714 人中，女性占 53%，平均每个行政村有外来人口 91 人，平均

每个行政村就有 2.3 个涉外婚姻家庭。在来自国外 7927 人口中,女性占 73.07%。她们大都因为婚姻关系嫁到边境地区”<sup>[20]</sup>。因而,女性人口流动在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动中表现突出。

2. 婚姻挤压与妇女流动。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超过 30 年,在中国父权制文化传统和男性偏好的现实中,其产生的最严重的或潜在的问题在于造成中国人口构成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人口短缺。有学者指出在实践层面,中国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实行的是“一孩半”政策<sup>[21]</sup>,也即那些第一胎生了女儿的家庭,都要再让妇女怀二胎,利用 B 超等性别鉴定生育技术,若为女婴则选择流产;若为男婴,则采取超生接受罚款的办法将男孩生下来。有一定数量的女婴通过非法的 B 超婴儿性别鉴定而被流产,正如美国胡德森(Valerie M. Hudson, Andrea M. den Boer)等学者在《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中,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所揭示的:因流产等原因,中国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出 1995 年有 800000 个女性缺失(Missing Females)。“1995 年以来中国每年消失女性人口约 100 万”,到 2020 年这些消失的 15-34 岁的女性人口将达到 33059694 人,那意味着到 2020 年超过 3 千 3 百万的中国男性找不到老婆,成为威胁区域安全的剩余人口<sup>[22]</sup>。

人口出生性别比较高的省份(2000 年)为陕西(125.15)、河南(130.3)、安徽(130.76)、湖北(128.08)、湖南(126.92)、江西(138.01)、广西(128.8)、广东(137.76)、海南(135.04)。2000 年以来全国只有 1 个省份处于正常值范围,30 个省份超过 107,其中安徽、江西和陕西三省出生性别比高居 130 以上,是全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省份。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然保持在 118.08<sup>[23]</sup>。在国际学术界,使用“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概念来描述、衡量婚姻年龄人口的性别比,指可结婚的男性与女性在人口数量上的不平衡。中国持续居高的出生性别比,意味着“婚姻挤压”的问题将十分突出,而且遍及中国绝大部分省份。由于人口失衡而导致的婚姻市场短缺中,农村的弱势男性就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在未来

的竞争中,也将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男性,会成为因女性短缺而不得不忍受性压抑的“光棍”<sup>[24]</sup>。地处边疆的云南省就成为中国内地婚姻市场女性短缺的补充。近年来,农村婚姻年龄女性往往流往陕西、河南、山东等出生性别比较高的省份,云南成为女性婚姻人口的主要输出大省。笔者在云南农村调研时会普遍听到村民说“村里的小姑娘都走了”,年轻人“到城里打工就是为了找个姑娘”。出生性别比较高的内地省份从云南等边疆欠发达地区买新娘、少数民族新娘延伸到买外籍新娘,巨大的婚姻需求市场形成的拉力使得女性人口的流动呈现出从边疆到内地,从境外到境内的趋势,跨国的女性替补式流动继续发生。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从边境地区流向内地,还是从境外流入中国,边境地区的流动妇女往往都成为拐卖人口犯罪的主要目标人群。

## (二) 移民故事及女性移民在中国面临的问题

叶罕是一位缅甸籍昂族妇女,现居住在德宏瑞丽南桑德昂族村。因父母亡故早,嫁到中国前与其 3 个兄弟姐妹辛苦劳作,以耕作、烧炭为生计。2004 年在赶摆时认识中国德昂族小伙子,觉得他帅。不久,小伙子晚上骑摩托车到缅甸就把她带到中国,留下茶叶、干鱼、钱等礼品在她家门口。按德昂族风俗,这些礼物是向叶罕的家人表明家中的女儿被小伙子看上了。按德昂族风俗习惯,中国的德昂族小伙子家请长辈在两天内到叶罕家提亲,经过商议,花了缅币 10 多万,人民币约 6000 多元钱把叶罕娶到了中国。叶罕已经在中国生活了 8 年,并与其中国丈夫生育了两个孩子,孩子已经落了户口。叶罕在村子里生活平时都说德昂语,慢慢地能说一点汉语的叶罕有时也会到瑞丽街上卖点蔬菜。她觉得在中国生活很安定,但与缅甸相比不太习惯的方面就是寺庙少。然而,作为在中国生活的缅甸妇女,叶罕还面临许多实际的问题,最困扰她的就是像许多嫁到中国来的缅甸妇女一样,她们不能在中国落户。她说“没有户口,心里总觉得不好在。”2010 年以来,德宏州地方政府实施“边民入境通婚备案登记证”制度,对多年来民间产生的普遍存在的事实婚姻予以登记,以加强对跨国婚姻的管理。叶罕说“叫我们办那个本本(通婚登记证),

都是娶缅甸媳妇的人要办，中国媳妇都不用去办，我们觉得害羞了”。德宏州是艾滋病高流行地区，政府疾控部门也加强了对缅籍新娘们的艾滋病监测和干预，叶罕说“寨子会在广播上通知：娶缅甸媳妇的，都要上来抽血、打针啊。我们的名字广播上都会念着，我们也会害羞了”。

像叶罕这样的缅籍新娘从缅甸嫁到中国生活了8年，无疑已经具备了“跨国移民”定义的三个基本要点：一是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二是在异国居住的连续性时间跨度；三是迁移的目的性<sup>[25]</sup>。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下定义叶罕这样的外籍新娘，她们其实就是普通的跨国移民。缅籍妇女面临的诸多不适应，有文化差异的因素，也有来自国家法律、政策的因素。2009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下辖的潞西、盈江和陇川、瑞丽4个边境县（市）20个边境乡镇（这里不含潞西市勐戛和陇川县龙把镇）涉及中缅跨境婚姻的行政村有107个（含边境乡镇的非边境村），自然村692个，中缅边民婚姻6520对。其中，嫁入中国的缅甸妇女5235个，占边民跨境婚姻缅籍人数的80.29%<sup>[26]</sup>。可见，像叶罕一样，这是一个有一定人口规模的跨国女性移民人群。叶罕生活在云南省的瑞丽市，而有许多像她这样的女性却经过云南的中转，生活的足迹遍及中国内地的30个省份。这些希望通过婚姻移民到中国的来自亚洲多国的外籍新娘在婚姻登记、落户等合法身份获取方面面临诸多困境。

1.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没有合法的婚姻证明，外籍新娘不能落户。而要取得合法的婚姻证明，外籍新娘必须办理合法的入境手续、持有所在国身份证明、婚前健康检查证明、非婚证明。实际的问题是像叶罕这样的缅籍女性移民作为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边境实行的是松散的边民出入境管理，并不需要入境护照。因受到缅甸民族地方武装政府的阻挠而难以从移出国取得身份证明（缅语称“马邦丁”），若申请需要5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获得；有的妇女因贫困难以担负申请费用。女性移民难以取得婚前体检证明，只有到曼德勒、仰光等大城市有证明资质的医院才能取得健康证明，取证难度与成本增大。对于非婚证明，缅甸目前未明确具体的

婚姻机构，缅甸公民结婚一般是通过本地有威望的长者公证，父母和当事人同意即视为正式结婚。因而，若严格按涉外婚姻管理规定办理结（或离）婚手续，多数缅甸人难以提供齐全证明材料，致使缅甸涉外婚姻当事人婚姻证明形式多样且难以符合中方规范要求，致使婚姻当事人无法正常登记或登记合格率低，难以办理落户手续，出现了大量事实婚姻（非法婚姻）<sup>[26]</sup>。女性婚姻移民难以取得合法婚姻登记，未登记（undocumented）婚姻状况大量存在。在德宏州边境乡镇统计的6520对中缅边民跨境婚姻中，已办婚姻手续的有1102对，占16.90%；未办理婚姻手续的有5418对，占83.10%<sup>[26]</sup>。一定数量的移民女性因不能获得合法的、有效的证明，缺乏合法身份却仍然“滞留”在中国。按照国际移民组织的定义，非正规（irregular）移民指“由于非法入境或签证失效，在过境国或收容国缺乏法律身份的人。”<sup>[27]</sup>这些因婚姻流入的女性移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的“非正规移民”。

2. 中国一直是传统的移民输出国，政府部门在管理诸如外籍新娘这样的跨国移民时，相关的移民法律、政策还相对滞后。从法律层面看，中国目前尚未起草、颁布《移民法》，也无管理移民的专门机构。中国现有的较僵化的《出入境管理办法》，以出境、入境为核心对人员跨国流动的简单和割裂式规范，已经不能适应外国人出境入境和在中国居留融入的复杂情况。这需要通过《移民法》起草来解决此问题。移民法就是要通盘考虑人员的出境、入境、居留、边检、驱逐、入籍、难民、融入、跨国犯罪等跨国流动各个环节，及各环节间联系等移民问题，全面地规范人员的跨国流动。从实践层面看，一方面中国“绿卡”配额太少。自2004年颁布实施了《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以来，仅有1000人左右获得了中国“绿卡”<sup>[28]</sup>。另一方面，获取绿卡的门槛太高。像世界许多国家那样，中国的移民政策只接受高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与流入中国的男性移民相较，通过婚姻流入中国的亚洲女性移民呈现低教育程度、低技术、贫穷等特点。在世界范围内因移民政策的性别盲点，教育程度低、低技术、穷困的女性移民通常难以跨过移民政策高门槛，取得合法身份，产生非法进

入、非法延期、滞留问题。

3. 因难以取得合法身份和缺乏对这类“非正规移民”合法化的法律、政策支持,流入中国的女性跨国移民群体的人权、妇女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以往这些来自亚洲各国的女性婚姻移民被当成非法入境、非法居住、非法工作的“三非人员”,不仅要成天为被驱逐而担心,取得移民身份、公民身份尚缺乏现实基础,令她们感到无望。社会文化融入存在政策性障碍,女性移民权益不能受到法律保障,有的在遭受家庭暴力时不能得到社会支持及法律保护。女性移民易成为有组织跨国人口贩卖的目标人群,人口贩卖成为继毒品、军火之后的第三大暴利行业,每年全球遭遇跨境拐卖的人口高达80万,其中80%的受害者是女性。包括云南、广西在内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及一些边境地区,是世界上妇女儿童拐卖犯罪高发地区,是拐卖人口的重要流出、流入和中转地。女性受害者被迫结婚或进入色情、性产业,遭受性剥削,缺乏相关法律政策保护,跨国流动妇女易成为有组织的跨国犯罪的目标人群,引发跨国移民的安全流动问题。

从国际移民现状及跨国移民理论框架来看,非正规移民(irregular)是当今全球都面临的共同问题。1999年在曼谷召开了国际移徙问题学术研讨会,21个与会国家一致同意采用“非正规移徙者”这一定义,这个术语自此开始得到广泛使用<sup>[9]</sup>。“非正规(irregular)移民”指由于非法入境或签证失效,在过境国或收容国缺乏法律身份的人。此术语适用于违反入境规则的移民和其他未经授权而在收容国居留的任何人(也称作秘密/非法/无证件移民或处于非正规状态的移民)。移民局称其为“非正规入境”,而不是“非法入境”,其行为仅被视为违反管理条例,而不是犯罪行为<sup>[16]</sup>。这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为了改变生活境遇而移徙它国的移民们,采取去罪化的倾向。据2008年统计,流入欧盟国家的非正规移民约为190~380万人,占欧盟5亿总人口的0.39%~0.77%,来自南欧国家的移民是欧盟移民治理的难点。正规化和驱逐出境是欧盟解决非正规移民的移民政策核心,只要有工作证明,无犯罪记录,并提供在欧盟会员国居住历史凭证,非正规移民们就可提出正规化移民申请。从1996到

2008年间欧盟17个成员国推出43项合法化计划,共有320万非正规移民获得合法身份。同时,对非法移民,欧盟国家可拘留其18个月,5年内禁止进入欧盟国家,加大对雇佣非法移民雇主的制裁<sup>[29]</sup>。美国是传统的移民接收国,当今美国的国家移民战略定位为:美国要成为全球移民首选目的地国家。美国每年有50万非法移民进入,约有1200万非法移民,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非法移民被驱逐离开美国<sup>[30]</sup>。墨西哥移民是美国非正规移民的治理难点。美国2001年提出的“Dream Act(梦想法案)”,即外来未成年人发展、救济和教育法,2010年获得国会通过。该法案主要针对非正规移民的第二代后裔,即16岁以前进入美国,完成高等教育,至少服2年的兵役可成为美国公民<sup>[31]</sup>。可见国际上针对非正规移民管理,采用不同的政策,多数国家一般采用“合法化(legalization)”的办法解决。

总之,中国社会中日渐增长的“外籍新娘”是全球化中女性跨国移民的必要组成部分,跨国婚姻是较不发达国家女性追求向上流动的一个途径,体现女性移民跨国流动的主动性。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但人口的性别失衡问题十分突出,是人口构成中的短板,而成为吸引亚洲女性跨国移民流动的巨大洼地。跨国移民问题在考验世界各政府的治理能力,墨西哥移民对于美国,穆斯林移民对于欧盟,亚洲女性移民对于中国都是同样棘手的移民问题,对中国当前的移民法律政策提出巨大挑战。《移民法》颁布、实施是中国移民问题治理的法律保障,设立移民局是移民治理的机制保障,建立包括提高绿卡配额、非正规移民合法身份取得、社会文化融入、人权保障在内的移民问题应对综合体系是移民治理的制度保障。“桥头堡”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战略试验区,也是法规、政策制定的试验区。云南省政府应当发挥“桥头堡”政策优势,加强地方性移民法规建设。通过移民法规的建设,“外籍新娘”才能成为女性移民,最终成为中国公民,中国对跨国移民社会问题的治理具有全球意义。

#### 参考文献:

- [1] Shen Haimei. Inflow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Challenges China's Migration Policy [EB/OL]. [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11/0908\\_china\\_](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11/0908_china_)

- immigrants \_ shen. aspx # \_ fm10 , September 08 , 2011.
- [2] 陈建军. 常住上海的日本人总数首次突破5万, 为10年前的6倍 [EB/OL]. <http://world.people.com.cn/GB/13954620.html>, 2011-09-05.
- [3] 公安部网站. 2009年入境旅游外国人人数统计(按目的统计) [EB/OL]. <http://www.mps.gov.cn/n16/n1237/n2131945/2287077.html>, 2010-01-14.
- [4] 中华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数据》 [EB/OL].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zgrk/2011-05/30/content\\_22671678.htm](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zgrk/2011-05/30/content_22671678.htm), 2011-05-30.
- [5] 新华网. 云南积极参与GMS合作, 建立全面合作机制 [EB/OL]. [http://yn.xinhuanet.com/gov/2012-09/17/c\\_131854571.htm](http://yn.xinhuanet.com/gov/2012-09/17/c_131854571.htm).
- [6] 中华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数据》 [EB/OL].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zgrk/2011-05/30/content\\_22671678.htm](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zgrk/2011-05/30/content_22671678.htm), 2011-05-30.
- [7] 国际移民组织(IOM), Key Migration Terms, [EB/OL]. <http://www.iom.int/jahia/Jahia/about-migration/key-migration-terms/lang/en#Immigration>.
- [8] 李其荣. 全球化视野中的国际女性移民 [J]. 社会科学, 2008, (9): 15-25.
- [9]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RISD). 男女平等: 在不平等的世界里争取公正 [Z]. 2010: 114.
- [10] 美国国务院. 世界人口贩运报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R]. 2010: 34.
- [11] 李明欢. 女性在国际人口迁移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7, (4): 13.
- [12] 何裕华, 等. 广州地下菲佣市场调查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1/10/c\\_12965083\\_3.htm](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1/10/c_12965083_3.htm) 2011-01-10.
- [13] 周建新.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及其子女的身份困境——以广西大新县壮村个案为例 [J]. 思想战线, 2008, (4): 1-8.
- [14] 鲁刚. 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 (6): 5-9.
- [15] 闫利娟. 跨国移民的国际法规范及我国相关法律的完善 [J]. 法制与社会, 2010, (3): 40.
- [16] 李明欢. 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 [J]. 厦门大学学报, 2000, (4): 17.
- [17] 周聿峨, 阮征宇. 当代国际移民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J].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2003, (2): 3.
- [18] 李明欢. 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再探讨 [J]. 厦门大学学报, 2010, (2): 21.
- [19] 云南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办公室. 云南妇女儿童发展规划(2001-2010年)省级成员单位中期监测评估报告汇编 [G]. 2008: 74.
- [20] 云南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办公室. 2009年云南省妇女儿童工作调研报告汇编 [G]. 2009: 19-21.
- [21] Wang Feng and Cai Yong, China's One Child Policy at 30 year. [EB/OL].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0/09/24-china-one-child-policy-wang>, September 24, 2010.
- [22] Valerie M. Hudson & Andrea M. den Boer, Bare Branches: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Asia's Surplus Male Population [M]. The MIT Press. 2004: 157.
-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数据 [EB/OL].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zgrk/2011-05/30/content\\_22671678.htm](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zgrk/2011-05/30/content_22671678.htm), 2011-05-30.
- [24] 张翼. 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及即将造成的十大问题 [EB/OL]. [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zxwz/t20041117\\_3459.htm](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zxwz/t20041117_3459.htm), 2005-04-20.
- [25] 张跃辉. 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 [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99e92701010u3g.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99e92701010u3g.html), 2012-01-26.
- [26] 杨晓兰. 推进桥头堡建设, 急需关注中缅边境跨境婚姻问题——以德宏州边境一线农村为例 [C].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313.
- [27] 国际移民组织(IOM), Key Migration Terms [EB/OL]. <http://www.iom.int/jahia/Jahia/about-migration/key-migration-terms/lang/en#Immigration>.
- [28] 张静. 04年以来约1000名外国人取得中国永久居留权 [EB/OL]. <http://www.sina.com.cn>, 2011-05-16.
- [29] Diego Acosta, Handling Irregular Immigration in the EU, ISN Insights, [EB/OL]. <http://www.isn.ethz.ch/isn/Digital-Library/ISN-Insights/Detail/?> htm. 2011-09-08.
- [30] U. S. Immigration Policy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B/OL]. [www.cfr.org/content/publications/attachments/Immigration\\_TFR63.pdf](http://www.cfr.org/content/publications/attachments/Immigration_TFR63.pdf).
- [31] Luis Miranda. Get The Facts On The DREAM Act, [EB/OL]. <http://www.whitehouse.gov/blog/2010-12-01>.